

饑餓理論與文學研究——以阿城《棋王》為中心

曾繁裕*

摘要：文學與文化研究愈漸重視身體的呈現方式、象徵意義和背後反映的社會現象，剖析身體的機能和哲學內涵尤具創新價值。饑餓是尚待深究的身體現象之一，對此瞭解可翻新對後苦難文學創作的認識。然而無論中外，中國文學的研究領域仍未有結合相關理論以分析作者經驗與文學生成的專著。本文引進西方對身體、饑餓和創傷的相關理論和觀點，探討如何以作者的知覺經驗為起點，結合理論分析，解釋饑餓與文學創作和呈現的關係，並通過引用阿城中篇小說《棋王》為例證，供饑餓的文學理論建設和應用作參考。

關鍵字：身體、饑餓、文學理論、後苦難、《棋王》

近年來，文學與文化研究愈漸重視身體的呈現方式、象徵意義和背後反映的社會現象，剖析身體的機能和哲學內涵尤具創新價值。饑餓是尚待深究的身體現象之一，對此瞭解可翻新對後苦難文學創作的認識。在深入討論饑餓理論與文學研究之間的關係前，需先引用梅洛龐蒂（Maurice Merleau-Ponty）和伊莉莎白·格羅茲（Elizabeth Grosz）的觀點來理解身體。對梅洛龐蒂而言，身體是一個由知覺主導、綜合不同身體組織和功能以「趨於平衡」的系統。¹ 這系統具有吸收和處理外在資訊、輸出個人感官和意見的功能，是個人主體與外界互動時必須通過的媒介，其性質與狀態限定了兩者互動的形式和內容。而伊莉莎白·格羅茲在其專著《易變的身體：走向一種身體的女性主義》（*Volatile Bodies: Toward a Corporeal Feminism*）（1994）中，則區分了身體「由內而外」和「由外而內」這兩個面向。對於前者，她藉著心理分析、神經生理學與現象學等方法，釐清精神屬性、體質狀態、身心關係等決定人體作為主體與外界連繫的媒介的功能；對於後者，她則使用知識譜系學、後結構主義的方法，還原身體作為話語產物的客體本質。² 身體既是主體，又是客體，其複雜的內在性和主客關係常被引伸至性別研究

* 曾繁裕，中山大學 中國語言文學系（副研究員）。

1. Maurice Merleau-Ponty, *Phenomenology of Perception*, trans. by Colin Smith, London: Routledge, 2002, p.177.

2. 詳見 Elizabeth Grosz, *Volatile Bodies: Toward a Corporeal Feminism*,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4.其中，第二部分「由內而外」（The Inside Out）和第三部分「由外而內」（The Outside In）作為整本專著的主體，分別分析了身體的內在功能和外界在塑造身體象徵意義方面的作用。

方面的討論，正如格羅茲便透過解構身體的物理組成和象徵意義，闡述被意指的身體的多變性、流動性和歷史性，而女性身體作為歷史定義和生物分類學所限制的象徵之物，被評為應當再定義、再象徵，引向行為解放和多元解讀。

性別解構是身體研究的主流，然而性別只是身體的其中一項特質，身體有許多行為、狀態、功能都值得理論家重視，例如勞動時的身心狀態、罕見病患的身體獨特處境、日常生活中的舉止姿勢、壓力下的身體表現等，都未獲足夠討論。唯獨對身體作多方面研究，才能建立整全的身體觀，讓身體不同特質的交叉連結與互相影響得以揚發，既加深對一個身體片面的瞭解，亦辨清身體內部、身體與身體和身體與外界之間的宏觀關係。這對文學研究尤為重要，因為文學分析出於對文本的重視，容易肢解當中被呈現的角色身體，缺乏對被文字敘述的身體部分背後的整全身體作理解。而預先具備一套整全的身體概念，可避免在分析時以偏概全或以管窺天。

要把整個身體的知識網路勾勒出來並且理論化，是一項巨大工程，本文僅就身體的饑餓機理、饑餓的創傷意義和饑餓與文學表達的關係作討論，立意於透過發掘饑餓可被理論化的資源，建構一個不單是文本分析而是兼顧理論的研究框架，既可用於研究作者的饑餓經驗如何影響文學呈現，亦可供其他方面的身體文學研究作參考。

一. 西方饑餓研究與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

大衛 H. 荷本 (David H. Holben) 為饑餓立下四項定義：「(1) 對於食物的動力、需要和渴求；(2) 因一段時間沒進食而產生的不安感；(3) 在非自願情況下缺乏食物，因而產生不適、疾病、體弱和痛楚；和 (4) 在非自願情況下缺乏食物本身」，³ 他的定義建基於缺乏食物的情況及該情況下身體可能出現的反應。對於饑餓感的產生，亞歷山德拉 W. 朗格 (Alexandra W. Longe) 曾作全面分析。在否定胃部本身的膨脹和收縮對開始和停止進食具有決定性影響後，⁴ 她指出一系列的「邊沿因素」(包括氣溫、環境、口腔情況、食物量、血糖水準變化、和特定化學物質的水準) 集結起來與血胰島素、瘦素和小腸膽囊收縮素產生作用，才會讓中央神經系統向個人發放饑餓或飽足的資訊。⁵ 她的分析顯示饑餓並非由單一器官的狀態決定，而是由外在於人體的因素與人體內互相接連的機能複雜地交叉影響下產生。至於缺乏飲食所衍生的感覺，印度學者 N. 沙昆他那·

3. 見於 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of the National Academies, *Food Insecurity and Hunger in the United States: An Assessment of the Measure*, Washington: The National Academies Press, 2006, p.47. 該書中關於饑餓的定義引自 D. H. Holben, *The Concept of Hunger*. Background paper for the Panel to Review the US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s Measurement of Food Insecurity and Hunger, Washington.DC: Centre for National Statistics, 2005.

4. 朗格討論了沃爾特·伽農 (Walter Cannon) 和 A. L. 沃什伯恩 (A. L. Washburn) 首個關於饑餓感的實驗。該實驗中，沃什伯恩「每天把一條長管裝進他的喉嚨，然後閒置數小時」，長管連接一個氣球，以探測當氣球在他胃部膨脹或收縮時，會否產生飽足或饑餓的感覺。朗格評論：「後續的研究已顯示，胃部收縮甚至胃部本身，都不是饑餓回饋的先決條件。」詳見 Alexandra W. Logue, *The Psychology of Eating and Drinking (Fourth Edition)*, New York: Routledge, 2015, p.14.

5. 同上，第30和32頁。

曼尼 (N. Shakuntala Manay) 和 M. 沙達薩拉史窪米 (M. Shadaksharaswamy) 則提供了生理感覺和心理感覺的剖析。他們在其專著《食物、事實和原則》(Food Facts and Principles) 的第三版 (2009) 中寫道：

飢餓通常是一種不快情感，驅使一個人尋找和進食食物，也是一種與胃部收縮相關的生理狀態。收縮是強制性的，且會維持一段時間然後隨胃部進入休息狀態而消散。沒進食但已平息的飢餓情況會再次出現，且具有更大強度。除了胃部收縮所導致的緊張、噁哩咕嚕和空腹感，飢餓者或許還會經驗一些普遍的感覺，例如虛弱、易怒、間歇性頭痛，甚至噁心。⁶

兩位學者所指的「胃部收縮」是缺乏食物的其中一種反應，而非飢餓感產生的原因。他們具體地描述身體在缺乏食物的情況下機械式產生的負面知覺和感覺，反映身體在因缺乏營養而機能衰退之前，會發出懲罰訊號，警告身體的擁有者儘快尋找食物，並避免下一次飢餓的發生。

飢餓這議題備受醫學界關注，同時受社會學界重視，因為這兩學科分別奠基於維持人類生命和維持社會穩定這兩大目的，而飢餓正危害個人以至集體的常態。文學研究雖只是一門針對文本的學科，焦點不在人類健康和社會秩序，但亦需對飢餓充分瞭解，因為這有助於分析文學在傳達、轉喻、修改、遺忘、創造和扭曲身體經驗方面的作用，從而將文學呈現的飢餓或飽足合理地指向與歷史、現實、虛構和期望相關的解讀。

中國的文學研究領域現已有大量關於飢餓的論文，⁷ 主要是對特定作品中的飢餓敘事作分析（如向友誼〈虹影《饑餓的女兒》中的飢餓敘事〉〔2016〕）和比較（如朱簫郡〈「飢餓」困境下女性獨立意識的覺醒與失落——《殺父》與《饑餓的郭素娥》的對比閱讀〉〔2017〕），及以飢餓敘事為核心歸納個人創作史（如景銀輝〈童年創傷、歷史記憶與文化症候——莫言小說中的飢餓敘事〉〔2013〕）和探索新的文學史視角（如李小紅和彭嵐嘉〈新世紀長篇小說中的「飢餓」敘事——以20世紀中國文學為參照〉〔2015〕）。中國學者大多以現當代文學作品為研究飢餓的對象，⁸ 大概一則因為王粲《七哀詩》這類述及飢餓的作品在古代的文學主流中不算多；⁹ 二則因為五四新文學運動解放了雅文

6. N. Shakuntala Manay and M. Shadaksharaswamy, *Food Facts and Principles* (3rd Edition), New Delhi: New Age International, 2009, p.4.

7. 如於中國知網搜索「飢餓文學」這關鍵字，可見292項相關的研究成果（截至2020年2月5日），見中國知網：https://kns.cnki.net/kns/brief/default_result.aspx（登錄日期：2020年2月5日），當中包括中國與外國文學研究，兼有期刊論文和碩博論文。

8. 研究古典文學中的飢餓的例子有羅家湘和王璠的期刊論文〈饑餓體驗與荒禮救護——《詩經》凶禮研究之一〉（2017）和吳雅萍的碩士論文〈北宋詩歌「饑餓感」研究——以張耒詩為中心〉（2014），饑餓研究在古典文學領域尚未普及。

9. 《七哀詩》當中，「出門無所見，白骨蔽平原。路有饑婦人，拋子棄草間。顧聞號泣聲，揮涕獨不還。」是古典文學中描述饑荒情況的經典。古代的雅文學中，饑餓多用於映襯作者的風高亮節而被略述，例如陶潛《歸去來辭並序》啟始自述家貧，說自己「幼稚盈室」卻「瓶無儲粟」，但沒交待饑餓的詳情，而將重點放於自己的仕途和淡薄功名利祿的心態。

學所屏閉的苦難題材，饑餓題材於是頻繁地呈現於與充滿戰亂災荒的宏大歷史平行的文學史，得以成為瞭解近代文學發展脈絡的重要線索，魯迅《傷逝》、路翎《饑餓的郭素娥》、蕭紅《生死場》、王若望《饑餓三部曲》、阿城《棋王》、劉恒《狗日的糧食》等小說，串連民國至今的集體饑餓記憶，讓研究者能藉虛構的故事，還原作者把苦難編寫進角色經歷的時代背景。這些近代作品與作者個人史的互文性在具有較多可考資料的基礎上，具有豐富的研究空間。

部分中國學者在討論饑餓時，已注意到文本呈現的饑餓不僅投射歷史記憶，而且本身具有身體性，即饑餓是個人身體現象，而非只是片面的、集體的、無知覺的、客觀的、條件反射的社會現象，例如劉傳霞的學術論文〈饑餓的政治文化詩學——論中國20世紀80年代文學中的饑餓敘事〉（2009）在引言部分，徵用百度百科有關生物營養學對饑餓所作的定義和解釋，以及身體饑餓所產生的文化現象，來為文章立論，將饑餓敘事區分為消極和自貶的啟蒙主義類和反饑餓與壓迫的馬克思主義政治詩學類。¹⁰ 雖然她的論文集集中討論政策和政治話語如何造成現實中的饑餓問題和產生文學中的饑餓敘事，但沒忽視饑餓的個人和生理性質，在討論高曉聲《「漏斗戶」主》、張賢亮《綠化樹》、史鐵生《我的遙遙的清平灣》、劉恒《狗日的糧食》、莫言《透明紅蘿蔔》等作品時，她從角色的主觀角度出發，分析饑餓處境對他們生、心理造成的壓力，而非以「一窮二白」和後苦難反思這些大論述，埋沒作者和角色個人處境的獨特性，這不同於孟隋的期刊論文《中國改革開放初期饑餓文學的政治邏輯》（2014）所採用的方法。同樣從政治角度分析文革後的饑餓題材，孟隋的方法比較「後結構」，即非從個人主觀的知覺經驗，而是從宏觀歷史和特定政治意識形態出發，把文學中的饑餓歸結為話語控制和權力運作的結果。¹¹ 這種方法假定作者基於個人意向的饑餓敘事在一個共用的、統一的意識形態框架內發展，而因文學文本涉及歷史復述，所以具政治性而可作政治理論分析。這類分析雖可對文學與歷史的呼應作準確解釋，但卻可能忽視不具政治性的特殊個人因素，並刪削饑餓的多元意義和隱喻。

為避免把文學中的饑餓約簡為一個政治學或社會學現象，而忽略饑餓對個人歷程的獨特意義及影響作者寫作意向的作用，在文學研究時，對身體現象的理解必須先於對社會經濟情況的瞭解，正如劉傳霞的研究，以饑餓的生理機制作為政治文化詩學論述的前提，便使她對集體現象的解釋不致脫離作者的個人現實生活場景，而針對角色的身體研

10. 參見劉傳霞：《饑餓的政治文化詩學——論中國20世紀80年代文學中的饑餓敘事》，《揚子江評論》2009年第三期，18至25頁（第18頁）。她的饑餓敘事二分法原文是：「中國現代文學中的饑餓敘述呈現了兩種主要主題：一種承接著啟蒙主義的學說，凸現的是饑餓的文化詩學意義，把饑餓視作中華民族貧困落後、愚昧麻木的表現；一種傳承著馬克思主義的階級鬥爭的學說，張揚的是饑餓的政治意義，把饑餓形成的原因歸結為社會分配不公、階級壓迫，消滅饑餓被敘述為階級革命、階級鬥爭的動力，從而形成了反抗饑餓、反抗壓迫的饑餓政治詩學。」

11. 孟隋在引言部分，已立意把饑餓情節指向權力意圖的作用而非肉身經驗。見孟隋：《中國改革開放初期饑餓文學的政治邏輯》，《湘潭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4年第4期，117至122頁（第117頁）。

究，則有效彰顯作者在共有的歷史處境下殊異的寫作動機和呈現手法，對闡發饑餓敘事封存的個人記憶獨具意義。下文將引阿城的後文革中篇小說《棋王》（1984）作進一步分析。

二. 饑餓、心理創傷與文學產生的理論交織和例證

首先，在解釋饑餓與創傷的相關機制前，須定義以下使用的「記憶」一詞。朗格在解釋飲食心理學時所用的「記憶」，只是神經科學與認知方面的記憶（正如他形容因「腦受損而無法記起一分鐘前的事件的病人會在吃完午餐後十分鐘，吃第二次午餐，而沒有腦受損的人則不然」¹²），關於記起與遺忘會否影響食欲，而下文則採用亨利·柏格森（Henri Bergson）的「記憶」，即「心思與事物交匯」。¹³ 作為一個認定知覺優先的哲學家，柏格森在認識論上澄清了記憶作為聯結個人經驗和言語行為的橋樑作用。用於饑餓方面，即缺乏飲食的個人首先透過感官（即上一部分提及的生理和心理反應）綜合饑餓的主觀概念，然後這複雜但可藉「饑餓」這個概念統一的身體現象，被神經系統儲存為記憶。饑餓的記憶可被提取和表達，亦具有潛移默化地、長久地影響個人行為、情緒和思想的作用。

據此定義，比對《棋王》中的饑餓敘事與作者阿城在1950至1970年代的生活處境，主角王一生的饑餓具有「心思與事物交匯」的記憶根據，是一種作者曾經歷、有肉身經驗支持、由個人記憶轉化而隨後經文字加工的饑餓。自從阿城父親鍾惦棐因發表〈電影的鑼鼓〉（1956）這篇批評電影工業管理問題的文章而被打為右派後，阿城一家一直處於物質艱缺的狀況，正如他在《文化制約著人類》中自述：「我的父親在政治上變故之後，家中經濟情況不好，於是在用錢上非常注意不買的限制，連花五角錢的夢也做不出。」¹⁴ 物質的限制讓阿城漸形成「限制即自由」的觀念，認為「做文章，總要找到限制，文章才會做好，否則連風格都區別不開」。¹⁵ 饑餓與物質缺乏混雜地交織阿城的經歷，進而影響他的寫作觀、寫作狀態和寫作內容，就如汪曾祺評《棋王》有關吃的刻畫：「非經身受，不能道出。這使阿城的小說顯得非常真實，不假。」¹⁶ 阿城的饑餓敘事雖然透過虛構的小說形式寫出，但其描寫和喻指都具有現實生活的根據，只是部分意義或因慣性自我審查和後苦難的創傷機制而收斂或以更含混隱藏的方式表達。

長期饑餓具有苦難性質，可造成心理創傷，其對個人造成的影響，可透過西方創傷理論作解釋。西蒙·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的論文〈超越快樂原則〉（Beyond the

12. Logue, *The Psychology of Eating and Drinking* (Fourth Edition), p.30.

13. Henri Bergson, *Matter and Memory*, trans. by Nancy Margaret Paul and W. Scott Palmer, New York: Zone Book, 1988, p.13.

14. 阿城：《文化制約著人類》，《文藝報》1985年7月6日。見於 <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1398229/> [登錄日期：2017年11月30日]。

15. 同上。

16. 汪曾祺：《汪曾祺說阿城小說《棋王》》，《名作欣賞》2005年第1期，1至2和34頁（第2頁）。

Pleasure Principle) (1920) 標誌性地帶領著關於後創傷狀況的討論，而凱茜·卡魯絲 (Cathy Caruth) 則在專著《無主的經驗：創傷、敘事和歷史》(Unclaimed Experience: Trauma, Narrative, and History) (1996) 透過闡發弗洛伊德的觀念來強調「二次創傷」等問題。對弗洛伊德而言，創傷是藉事件進入身體的心理痛楚，是一種因「驚嚇和恐懼」而產生的「神經官能症」。¹⁷ 他斷言「因對焦慮準備不足」而釋放的性刺激是創傷效應的主要動因，而伴隨創傷經驗的痛苦與疾病都是充斥原欲的。¹⁸ 相反，卡魯絲試圖把創傷脫離原欲中心主義的解釋，把創傷理論的焦點設於後創傷的效應而非原因。她專注於分析受害者的回憶閃現 (flashback)，從而論述受害者因記憶問題而在心理上再次受創的可能，這是弗洛伊德雖曾觀察但沒給予重視的。¹⁹ 雖然瞭解原欲有助探索持續饑餓時的心理變化，但對於文學研究，以饑餓的創傷反應作為研究重點則更具意義，因為這可顯示個人記憶在記錄和轉化饑餓的創造性過程中，可能因主體變化而作調整或扭曲。據卡魯絲理解，在創傷事件發生後，受難者可因災難事件的記憶閃回而遭受「二次創傷」²⁰，而與災難事件相關的記憶閃回決定了受難者的見證的表達方式、內容和真實性。記憶閃回的重複次數、變化和內容影響所呈現的災難歷史，而這正與海登·懷特 (Hayden White) 的歷史觀呼應，就他的元歷史批評，在編修歷史的過程中，所涉及的個人想像和意識形態因素必然導致被敘述的歷史主觀和失真。²¹ 同樣道理，饑餓經歷可在記憶中不斷纏繞個人，不斷創造新的創傷經歷，這可以在獲得溫飽生活後仍揮之不去。當一個作家想透過文字把自己過去的個人史表達出來時，他必然受限於記憶的消滅和變形，以及寫作時的社會意識形態，而其選擇採用的文學形式、修辭技巧、敘事的優次選擇和剪裁都會使其敘述的饑餓經驗，不同於過去的真实饑餓經驗。愈虛構而非自傳式的敘事，被敘述的饑餓經驗就愈難還原至過去的處境。若要察驗文本中的饑餓的身體性和記憶傳承作用，研究者必須瞭解作者過往有否饑餓經歷、饑餓經歷的創傷程度、饑

17. Sigmund Freud, *Beyond the Pleasure Principle*, trans. by James Strachey, New York: Dover Publication, 2015, p.6.

18. 同上，p.27.

19. 弗洛伊德在〈超越快樂原則〉第三部分，討論了「強迫性重複」。他重點討論導致重複行為的心理機制，而非重複行為本身的特性。除此之外，他把重複行為視作一個單純的整體概念，而沒如卡魯絲般仔細考察重複的形式（如回憶閃現）和時間性。

20. 卡魯絲對於「二次創傷」這個專有名詞的使用，在於指出再現的創傷經驗不同於「個人過去的、簡單的暴力或原生事件」，雖然是過去經歷的回歸，但帶著非常不同、陌生、不斷纏繞的性質。見於 Cathy Caruth, *Unclaimed Experience: Trauma: Trauma, Narrative, and History*,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6, p.4.

21. 懷特比較了不同的歷史寫作，包括年監和編年史等，論證史學家在編纂和演繹歷史時，必須加入個人想像以串連因果關係。這想像使歷史話語永無法客觀地反映歷史事實。而出於道德原因和政治目的，史學家無可避免地為史料定優先次序，並剔除不太相關的史料，以確保歷史情節的一致性，這讓歷史無法被整全表達。詳見 Hayden White, *The Content of Form: Narrative Discourse and Historical Representation*,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7和 *Tropics of discourse: essays in cultural criticism*,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8.

餓經歷與寫作之間的時間間距，以及寫作時的意識形態處境。

值得注意的是，慣性的肉身限制（飲食和享樂方面）對阿城造成類似精神創傷的影響，使他對寫作特別敏感，避免過去的困境記憶在組織敘述的過程中閃回，造成二次創傷。他在文革期間的寫作（如後來出版的筆記小說《遍地風流》）不旨在出版以求取文學地位，也沒有追隨文學潮流，可歸類為陳思和所謂的「潛在寫作」，²² 這種非主流寫作的延續造就阿城在《上海文學》出版中篇小說《棋王》時的轟動。本於他對描寫社會現象的克制沒因改革開放的環境而改變，比如王一生「主要是對吃要求得比較實在」，²³ 而作者亦沒把他繫上生產隊政治乃至大環境動蕩，不如同代知青作家如盧新華、王安憶和張抗抗的角色般發掘文革傷痕、尋索過去歷史的教訓，在一個後苦難但相對飽足的年代，這種召回饑餓記憶的方法，以及對政治以外的國家發展走向的喻示，為當時評論家和讀者創造嶄新的閱讀體驗和啟發，因而獨具文學史意義。

有別於在上山下鄉運動期間物質條件較佳的知青作家，如梁曉聲、王安憶和張承志，阿城藉小說主角王一生坦露自己對食物的高度渴求，並隱喻滿足生存條件是文化發展的必然基礎，如王一生母親的遺言：「你在棋上怎麼出息，到底不是飯碗」，²⁴ 王一生以面向現實的態度把自己孤立於平常知青所擁抱的理想主義之外，並以此作為文化基礎的逆向思維，精確而誠實地建設了一套為抗拒饑餓而生的苟且價值觀，間接造就文學界和評論界由歷史控訴往生存意志尋根的潮流轉向。雖然阿城無意讓作品進入主流文學史，甚至他坦言出版作品只為了賺稿費，以「買煙來抽」和「搞一個冰棍基金會」，²⁵ 但他為解決口腹之欲而產生、提煉個人過去的饑餓經歷、展現因物質困乏而生的功利道理的饑餓敘事，卻切中社會意識形態轉型時期的大眾需要，因為小說中，王一生餓食物，也餓棋，而食物與象棋所表現的個人在物質和精神之間的掙扎，是當時文化真空的中國社會內部的知識份子共同面對的，且沒因物質條件隨著現代化和城市化進程不斷進步而解決。

對於經歷過長期饑餓的作家而言，饑餓的懲罰訊號會烙進記憶，影響其創作意向與角色刻劃。饑餓與記憶的關係值得特別思考的地方有三方面，第一，角色的饑餓或飽足可以是作者自身的經驗重疊或理想投射，而非單單出於表達和象徵需要，其虛構背後有個人的現實體驗支持；第二，饑餓的記憶及其影響力和象徵意義是流動的，會隨時間和處境而改變，因此一個作家在不同時期對饑餓的敘述都不是基於原初經驗而一成不變，

22. 陳思和在《中國當代文學史教程》中指出「潛在寫作」是在沒有寫作自由的特定時代裏的地下寫作，不以出版為目的，亦無意追隨文學主流。

23. 阿城：《棋王、樹王、孩子王》，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3年（第9頁）。

24. 同上，第26頁。

25. 原文為：「我〔阿城〕於是冒了一個想法，懷了一種俗念，即賺些稿費，買煙來吸。……等我寫多了，用那稿費搞一個冰棍基金會，讓孩子們在伏天都能吃一點涼東西，消一身細汗。」節選自阿城《一些話》，見楊曉帆：《知青小說如何「尋根」——《棋王》的經典化與尋根文學的剝離式批評》，《南方文壇》2010年第6期，40至49頁（第45頁）。

而是因應新的寫作處境而調整；第三，饑餓可引發對社會狀況和個人生命的反思，因缺乏食物本身是一個社會資源分配的問題，而長期無法掌握糧食可帶來死亡的憂慮，這迫使饑餓者（尤其知識份子）思考如何調整理念和更變社會的運作方式。饑餓不能脫離身體而存在，記憶亦然，因此討論文本中的饑餓不能脫離現實生活中與記憶連繫的饑餓的身體屬性和時間性。瞭解饑餓的創傷性質，可明白後饑荒時期的身體狀況如何產生超越「饑餓-飽足」這二元框架的文學表現，讓含饑餓敘事的作品記錄作者的過去經驗，同時引伸出弗雷德里克·詹明信（Fredric Jameson）所指的「國家寓言」的作用，²⁶ 這對研究中國新時期文學作品尤為重要，因為寫於較富足的改革開放時期的饑餓，在召集個人記憶的過程中，往往提供讓國家進步的反思和方案（不論這是否出於作者的寫作意圖）。

阿城借吃的情節反映饑餓感和記憶中對饑餓的恐懼，用以否定文明在物質問題未被解決時的作用。在小說的第一節，敘事者（我）與王一生下棋，當旁人問敘事者：「據說你下棋時可以不吃飯？」他回應：「人一迷上什麼，吃飯倒是不重要的事。」然而，王一生卻不認同，說：「我可不是這樣。」²⁷ 其後，敘事者對王一生等吃和吃相的描述，印證了王一生重視口腹的飽足多於下棋的樂趣：

我看他對吃很感興趣，就注意他吃的時候。列車上給我們這幾節知青車廂送飯時，他若心思不在下棋上，就稍稍有些不安。聽見前面大家拿吃時鋁盒的碰撞聲，他常常閉上眼，嘴巴緊緊收著，倒好像有些噁心。拿到飯後，馬上就開始吃，吃得很快，喉節一縮一縮的，臉上繃滿了筋。常常突然停下來，很小心地將嘴邊或下巴上的飯粒兒和湯水油花兒用整個兒食指抹進嘴裏。若飯粒兒落在衣服上，就馬上一按，拈進嘴裏。若一個沒按住，飯粒兒由衣服上掉下地，他也立刻雙腳不再移動，轉了上身找。這時候他若碰上我的目光，就放慢速度。吃完以後，他把兩只筷子吮淨，拿水把飯盒沖滿，先將上面一層油花吸淨，然後就帶著安全到達彼岸的神色小口小口的呷。²⁸

王一生對送飯的留神和對吃的「虔誠」和「精細」，²⁹ 顯然不同於同時代作家陸文夫中篇小說《美食家》（1983）的主角朱自治吃朱鴻興頭湯麵那種追求味道的講究態度。他停下棋局，呼應他認為吃比下棋重要的立場外，重視的是不錯失取得食物的時機並把所有食物圓滿吞吃，不浪費任何讓他延續生命的資源，在普遍條件缺乏且前路充滿未知因素之下，他必須堅持這可隱喻國家「一窮二白」下的發展優次的價值取向。

26. 詹明信在其論文中指出第三世界的文學作品往往藉敘事喻指國家狀況，當中引用了中國作家魯迅作例子，詳見 Fredric Jameson, "Third-World Literature in the Era of Multinational Capital", *Social Text*, 1986 (15), pp.65-88.

27. 阿城：《棋王、樹王、孩子王》（第8頁）。

28. 同上，第10頁。

29. 這兩個詞語是敘事者對王一生的「吃」的評價。同上，第10至11節。

以創傷理論來理解，作者阿城曾經歷苦難般的饑餓時期，因此在書寫時讓王一生過去的饑餓經歷缺場，不容故事背景和個人創傷背景的重疊觸發心理創痛，倒集中寫王一生對吃的重視，並間接透過王一生與敘事者的對比來交待王一生曾經歷異於常人的饑餓之苦。³⁰ 雖然《棋王》沒構築王一生過去饑餓的感官經驗、情感、精神狀態，但他對吃的細緻興趣和執著，使作者的饑餓感的不斷召回和壓抑非常明顯和立體。

王一生透過區分對飽足和美味的追求來使自己有別於常人，但他循環往復的饑餓，體現了他平常的一面，而真正在小說中突顯他不凡的是下棋天賦，可是，他卻更重視吃而只視下棋為解憂的工具，這使小說充滿有別常理的解讀可能。一個在下棋方面超越常人的角色卻專注於平常人的生活問題，讀者乍看之下，是難以理解的。在相對富裕的時代場景下，當讀者發現個人的文化需求未有因經濟發展而得到重視時，便會感覺到王一生處身常人和超人之間的矛盾的吸引力，尤其這在小說中處於過去的矛盾與讀者於現在的現實生活所經歷的矛盾呈巧妙的對倒關係：在小說結尾部分，王一生一次勝過多個高手並非真正的勝利，因為他還需面對日後的飲食需要；而當時讀者雖日漸享受到改革開放的經濟成果，卻仍未能扭轉文化失根的敗局。這小說從個人饑餓與否定國術的經濟價值所衍生的文化隱喻，正是恢復教育後的一代需要的論述，《棋王》在文化界造成的轟動與其對韓少功所推動的文學/文化尋根運動的助力可證明這點。

三. 以《棋王》觀照其他同時代作品

進深一層，饑餓既作為隱喻，亦作為跨界思考的載體，延伸身體現象而上的多樣意涵。上述對《棋王》的分析，展現作者饑餓、角色饑餓與饑餓喻指的國家狀態三者的連貫性，可用於理解其他同時代、作者背景相似的作品，但需注意饑餓在不同文本脈絡下的解讀變數。

在《棋王》發表前一年，張賢亮發表了中篇小說《綠化樹》。這同是新時期書寫饑餓的代表作也展現著作者透過虛構故事所反思的過去事實與自況。雖然張賢亮是比阿城這知青作家年長一代的作家，代際上有差異，但他同樣經歷過、因而能藉文字表現饑餓之苦，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背景方面，張賢亮在反右運動（1957-59）中被定性，因而被流放至銀川的西湖農場勞改共十九年，³¹ 至鄧小平執政才平反並進入較之前開放的文壇。過去的極端艱苦，讓他用以訴說從前的第一身角色章永璘跟王一生一樣對吃錙銖必較，比如在他發現自己收藏的兩個稗子面饅饅都被老鼠吃掉後，他細緻地想：

九點鐘才開飯，我靠在疊起來的棉花網套上，幾乎要暈過去。如果這兩個稗子面

30. 例如王一生非常仔細地跟敘事者討論吃，並計算營養，說：「你剛才不是說的什麼『一天沒吃東西』，你十二點以前吃了一個饅頭，沒有超過二十四小時。更何況第二天你的伙食水準不低，平均下來，你兩天的熱量還可以的。」暗示自己比敘事者有過維時更久的饑餓經歷，接著他透過跟敘事者說的話，把自己與一般人在飲食需要方面區分出來：「你家道尚好的時候，有這種精神壓力嗎？有，也只不過是想好上再好，那是饞。饞是你們這些人的特點。」（同上，第11頁。）

31. 張賢亮第一次被囚是由1957年到1960年，在逃出三年後，他返回並續囚禁至1979年。

饅饅不丟，即使我不吃它也不覺著什麼。而這巨大的損失加深了我的恐懼心理，竟使我覺得非常非常的餓。饑餓會變成一種有重量、有體積的實體，在胃裡橫衝直撞；還會發出聲音，向全身的每一根神經呼喊：要吃！要吃！要吃！……我沒有力氣動彈，更沒有心思思想，只一個勁兒地轉念頭：必須把損失加倍地撈回來！³²

章永璘對稗子面饅饅這粗糧的重視，如同王一生進食時對「飯粒兒」和「湯水油花」的重視，近於拜物的程度，讓食物既消解崇拜又呼喚崇拜，在貧乏處境下富有無限想像的深度。

如果說《棋王》是跨饑餓而進入對藝能價值的反思，《綠化樹》則是跨饑餓而呈現共產主義下的性別政治。同是身體機能反應的產生與消解，《棋王》結合王一生有關象棋的敘事以類近道家的去慾思想帶出人或國家在歷史被動狀態下的出路，而《綠化樹》則透過女主角馬繆花滿足章永璘對吃的渴求來顛覆對中國傳統社會男權主導或毛澤東鼓吹的性別平等的想像。《綠化樹》中，馬繆花因她與其他男人的曖昧關係而擁有豐富糧食，因而可主導饑貧的、被慣性賦予性別權力的章永璘。在章永璘進入被戲稱為「美國飯店」這帶有資本主義、敵對意識形態意味的空間時，作者描述：「我敲敲門。她不說『請進』、『進來』，而是在屋裡大聲喊：『推嘛，門開著的嘛！』」³³ 馬繆花帶著一個身世未明的孩子卻不自卑，倒呼喝般跟章永璘說話。在章永璘隨後糾結婆媽地拒絕她所贈的饅饅時，她更「勃然嗔怒」地罵他：「你看你這個沒起色的貨！」、「扶不起個攔不起！那把饅饅給我放下，你哪兒來的還滾到哪兒去吧！」³⁴ 這可見在物質匱乏的處境下，共產主義的平權思想失效，女性天然魅力所集束的食物所取得的解決饑餓的能力，比意識形態有力地決定人際間的權力關係。

就饑餓引伸的跨界思考而言，層層推論將脫離作者個人的饑餓經驗，另外，饑餓敘事未必定然與作者的記憶及身體經驗相關，這是以饑餓理論分析文學作品時必需注意的限制與補充。因此，對於饑餓記憶深度有差異的作者及其喻指有差異的作品，需要調整分析策略，不硬套上苦難框架。比如在八十年代後期，中國當時的先鋒派代表余華藉中篇小說《古典愛情》（1988）重寫才子佳人的故事，所注入的饑餓元素用於揭示古典文學樂觀主義所遮掩的黑暗面，多於自況或諷喻毛時代的歷史。故事設定於約莫晚明崇禎年間，前半是才子有志於藉科舉取得功名、受心儀小姐以錢財惠贈支持的典型敘事，而後半則轉向反理想與驚悚情節，例如男主角柳生重遇小姐之時並不浪漫，破滅讀者因小說題目而生、對美好愛情的憧憬：

柳生行至屋內，見一女子仰躺在地，頭髮散亂，一條腿劫後餘生，微微彎曲，另

32. 張賢亮：《綠化樹》，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24頁）。

33. 同上，第47頁。

34. 同上，第50頁。

一條腿已消失，斷處血肉模糊。柳生來到女子身旁，蹲下身去，細心拂去遮蓋在女子臉上的頭髮。女子杏眼圓睜，卻毫無光彩。柳生仔細辨認，認出來正是小姐惠。不覺一陣天旋地轉。沒想到一別三年居然在此相會，而小姐竟已淪落為菜人。柳生淚如泉湧。³⁵

在饑荒的大背景下，原本儀表雍容的小姐被肢解、成為將被烹煮、吞吃的食物，慾望的對象突然成為同類相殘的血腥場景的主角，深刻地呼應魯迅《狂人日記》（1918）反烏托邦式的多重「吃人」喻指。就作品的時代背景而言，箇中的饑餓與作者個人經歷的連繫較《棋王》和《綠化樹》弱，因為後二者均以寫實風格記錄作者曾經歷的時空；而就作者的經驗背景而言，余華生於1960年，屬於知青之後一代的作家，不曾參與反右運動以及上山下鄉運動，自小跟隨從醫的父母於海鹽縣生活，物質相對豐足，與張賢亮和阿城的流徙歷程迥異。因此，若以「作者記憶——角色經驗-饑餓指向」這框架分析余華的《古典愛情》，就文本背景及作者背景方面，均容易造成過份解讀的問題。

據此，可見應用饑餓理論於解讀文學作品時，受限於作者經驗與角色經驗的距離，這一則會因作者經驗未必可考而存在變數，二則因作品中饑餓狀態的象徵程度增加而脫離身體經驗的真確性。當然，在自傳體、半自傳體小說的饑餓身體溯源方法以外，可另闢關於想像與虛構身體的饑餓分析方法，對小說虛實兩面的不確定作補全。

四. 總結

從阿城過去的個人饑餓經歷出發（雖然沒在他的自述文章中詳細交待），可理解到他在生理和精神方面的相關記憶，經過一段時間轉化，而在文革結束後八年/上山下鄉運動結束後六年才透過《棋王》以文字形式面向公眾。創傷機制塑造了他自我克制的寫作態度，並使王一生這饑餓角色略去過去的饑餓經歷。若使用後結構主義的角度分析，王一生對棋藝的實際作用的輕視是社會話語細緻地互相影響下的產物，順應特定時空下中國大眾對文化真空的焦慮，然而，若以饑餓為核心緊扣作者阿城作主觀分析，可見作品雖附合大眾的閱讀需要，但作者未必在呼籲文化發展的前設下寫作，倒可能只是在延續「潛在寫作」的過程中，巧合地讓自己對饑餓經歷的反思和轉化，在傷痕文學的潮流散退之時，經另類但非刻意的知青視角衝擊當時以審問歷史為本的文學反思手法而已。

對阿城的饑餓經歷、饑餓的文學轉化和饑餓的文學呈現還有許多探究和闡釋的空間，本文只是引之作一例證，解釋如何透過對饑餓現象的理論理解，結合作者本位的主觀分析方法，來產生與社會學或後結構分析方法不同而更能彰顯個人在文學作品中的主體地位的研究結論，張賢亮《綠化樹》則為輔例，把討論引伸至饑餓的意指可能，至於余華《古典愛情》，本於作者背景與文本背景的差異，可見饑餓理論的應用受限於饑餓經驗的虛構與象徵延伸。

35. 余華：《世事如煙》，台北：遠流出版，1991年（第277頁）。

中國文學研究領域無論中外，仍未有結合饑餓相關理論來研究作者與文學的關係的專著，美國學者樂鋼的專著《乞求的口：現代中國的饑餓、吃人與吃的政治》（*The Mouth That Begg: Hunger, Cannibalism, and the Politics of Eating in Modern China*）（1999）相對大篇幅地以文史結合的方式研究中國文學的饑餓敘事，³⁶ 但他那僅佔全書篇幅五分之一的研究沒有後繼者發展為更完整的理論研究框架。本文試圖拋磚引玉，在把饑餓定位於個人身體的基礎上，引入饑餓理論化與理論融入文學分析的方略，盼讓饑餓這如性別般與身體相關的現象，同樣在文學研究方面得到獨立而全面的討論。 □

36. 該書第二章題為〈書寫饑餓：從毛到道〉（*Writing Hunger: From Mao to the Dao*），當中的兩節分別從歷史背景和個人層面分析中國的饑餓狀況：〈饑餓的革命與革命的饑餓〉（*Hunger Revolution and Revolutionary Hunger*）和〈後革命的餘燼：張賢亮和阿城〉（*Postrevolutionary Leftovers: Zhang Xianliang and Ah Cheng*）。見於 Gang Yue, *The Mouth That Begg: Hunger, Cannibalism, and the Politics of Eating in Modern China*, Durham: Duke University, 1999, pp.145-221.